

总第
78—8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印章）

合订本 第二十七卷

希望过了8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2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78—80
辑

文史资料选辑

（第百一十七卷）

合订本 第二十七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怀念陈嘉庚先生/003

◎ 庄希泉

陈嘉庚先生的遗言/007

◎ 庄明理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经过//010

◎ 庄明理 洪丝丝

陈嘉庚与《南侨日报》/018

◎ 张楚琨

怀念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030

◎ 黄周规

回忆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035

◎ 李平衡

大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050

◎ 黄晓东

略谈谢冠生与国民党司法界/054

◎ 金沛仁

CC渗透的国民党司法界/060

◎ 裘孟涵

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067

◎ 金沛仁

奇形怪状的旧司法/079

◎ 朱国南

旧中国所谓“司法独立”三例/093

◎ 吴献琛

李光炯先生传/096

◎ 朱光潜

我所知道的郭泰祺/098

◎ 李铁铮

我的宫中生活（下）/103

◎ 李玉琴

质疑·补充·订正

对第24辑《1919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的订正/114

◎ 潘荣

盛世才在新疆/117

◎ 包尔汉

我任阿山宣慰使的回忆/130

◎ 包尔汉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184

◎ 包尔汉

西藏从政纪略/189

◎ 陈锡璋

成吉思汗陵寝概况与内迁经过/211

◎ 谢再善

成陵内迁及途经延安纪实/217

◎ 楚明善

洋和尚照空/220

◎ 巨赞

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228

◎ 阎迦勒

竹舍轶闻/234

——国民党利用战犯建立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的始末

◎ 黄瀛

质疑·补充·订正

两航起义史实有遗漏/243

◎ 王大庄等

回顾往事/247

◎ 翁文灏

我所知道的丁文江/257

◎ 朱庭祜

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创始时期/262

◎ 朱庭祜

回忆翁文灏先生/265

◎ 党刚

关于丁文江/269

◎ 翁文灏

怀念我的祖父翁文灏/270

◎ 翁维玲

回忆范旭东先生/272

◎ 黄汉瑞

永利碱厂和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斗争前后记略/276

◎ 余啸秋

范旭东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287

◎ 陈调甫

“永久团体”杂忆/296

◎ 何熙曾

李烛尘生平简记/302

◎ 张帆

宋子文、贝淞荪时代的中央银行/307

◎ 李立侠

张公权与中央银行/316

◎ 李立侠

中央银行兴衰简史/326

◎ 李立侠

金融企业家陈光甫/330

◎ 杨桂和

陈光甫与上海银行/337

◎ 童昌基

记中国旅行社/345

◎ 杨桂和

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350

◎ 章元善

陈果夫与国民党的合作运动/360

◎ 寿勉成

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371

◎ 张官廉

天虚我生与无敌牌牙粉/384

◎ 陈小翠 范烟桥 周瘦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八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怀念陈嘉庚先生

◎ 庄希泉

我是辛亥年在新加坡认识陈嘉庚先生的。当时，我奉上海革命军政府之命到南洋为革命筹饷，他是新加坡商会董事长、福建华侨筹款组织的负责人。那时的陈嘉庚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剪去辫发，已届不惑之年。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我在上海随父学商。当时的上海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中心之一。上海的泉漳会馆又是福建革命人士经常聚会之所。会馆办有中学一所，一批思想进步的人士在那里当教员。这所学校需要同乡商号提供资金，我就在这所学校里结识了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同情革命，向往革命。

1911年11月初，为响应武昌首义，上海举行起义，并成立军政府。全国25省区中，已有15个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但是英、美、日、法、德等帝国主义却把革命视为叛乱，指使广州、长沙、汉口、上海等地的外国税务司扣留当地海关税收，企图从经济上扼杀革命。军政府决定组织筹饷队，分赴海外，向广大爱国华侨募集军饷，希望海外华侨能在经济上对中国革命有所帮助。第一批派往新加坡的几个人，在广东、福建两省华侨中分别成立两个赞助会，但所募款数不多。上海都督陈其美决定派军政府财政部长沈缙云再赴南洋筹款，计划筹办一个实业银行，以期对革命有更多更经常的资助。股金预定为1000万，国内和南洋各募股500万。我与沈缙云有旧，他约我同往。临动身之时，沈缙云又调任南京政府交通财政部长。我和几个同志随他一起出发了。

我们辗转到了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已成为南洋华侨爱国进步运动的中心，革命气氛之高昂使我深受感动。我们很快即招满了股，把几百万元寄回上海。就在这筹饷过程中，我和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经常来往，



又因是同乡，过从更密。他慷慨解囊，给我们很大支持。另外，他还寄回几十万元支援国内的反清斗争。当我筹饷到了槟榔屿时，会见了该屿同盟会的负责人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等，都是同乡朋友。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加入同盟会，把这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陈嘉庚、黄金庆等许多爱国华侨的影响下，经黄金庆、陈新政两人介绍，我在槟榔屿参加了同盟会。我在志愿书上填上庄希泉三个字，还记得我的登记号是四万多。宣誓仪式上，我举拳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实业银行终于开业了，国内总行设于上海，南洋派出吴世荣到上海担任副经理；南洋总分行设在新加坡怒米之律街，我担任该行副经理，那年我才24岁。实业银行南洋总行的工作初步就绪之后，我即回国述职，时正值袁世凯破坏革命，拒绝到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取退让政策，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并派宋教仁北上当总理，宋还未上任却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袁世凯下令以武力镇压革命，上海陷于一片恐怖之中。沈缦云被通缉，逃往大连。我赶至大连，找到沈缦云，商议实业银行的出路问题。鉴于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气焰甚嚣尘上，银行不得不解散。待至将股金一一发还各股东之后，我重又回到新加坡，另寻救国之道。

1920年，我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女学，又开办一家国货公司。那时与陈嘉庚先生来往更密，我向他学习办学、办企业的经验。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李光前先生原在我公司工作，后来想转到陈嘉庚先生经营的商号去，而李光前与我公司订有合同在先，按规定，合同期未满离职是要罚款的。当时我想，李光前先生到陈嘉庚那里工作，也许对发挥他的才能更为有利，于是我支持他，并放弃一切要求。后来，李光前果然得以人尽其才，并成为陈嘉庚先生之快婿，是今天南洋最大的实业家之一。这本来是无足挂齿的小事，然而陈嘉庚、李光前竟多次对我表示谢忱。光前先生每次回国，还常来探望。

陈嘉庚先生倾家兴学，誉满海内外。他亲手创办的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培养了无数人才，尤其是集美航海学校所培养的航海专业人才，足迹遍及四大洲五大洋。在他的影响带动下，解放后李光前也出资数千万元，扩建了厦门大学。规模宏大，环境幽美，是厦门海滨一颗璀璨的明珠。陈嘉庚先生不仅在国内办学，他还为海外华侨子弟先后创办了五所华文中小学、两所中专；赞助兴办一所大学；资助过八所华侨学校。陈嘉庚先生办学目的是爱国、救国，因此，他表现出百折不回的顽强毅力。就集美、厦大而言，虽几经挫折，但他仍倾全力加以维持。这绝非沽名钓誉或浅尝辄止者所能为。陈嘉庚先生亲自主订的校训“诚毅”

二字，正是他办学精神的极好概括。

我也曾经探索过“教育救国”的道路，崎岖、坎坷，使我备尝艰苦。

1920年，我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女学，适逢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英国殖民当局深恐革命浪潮波及南洋，突然抛出一个所谓“学校教育条例”，规定创办学校必须注册，校长教员必须经当局审查方可任职；教材必须批准方能使用；甚至国内来的学生也需当局审查方准入学。这是英国殖民当局限制并扼杀华侨教育事业的苛刻条例，当即遭到华侨教育界以及商界、工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我们联名请愿，要求取消这一苛例，签名者竟达数万人。我们推举槟榔屿银行经理为代表到英国向政府请愿；选派余佩皋女士回国，向政府提出要求国际交涉。但英国殖民当局竟采取卑劣手段，纠集几所学校的御用董事，强行表决通过，并将我以及陈寿民等三个请愿代表拘留入狱。最后判我“永远驱逐出境”。我回到家乡厦门，满以为可以摆脱殖民政府的控制，为振兴民族教育贡献一份力量。在爱国侨胞的资助下，我和余佩皋女士重又创办了厦南女中。但到1925年因师生抗日爱国热情高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嫉恨，又把我拘捕入狱，余佩皋女士被迫星夜逃走。由己及彼，当年陈嘉庚先生兴学，其难可知。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是从实际出发的。抗战初期，蒋介石假爱国之名，欺骗华侨捐献巨款回国，陈嘉庚先生亦曾捐款几十万。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到全国各地慰劳视察。当他了解到华侨的血汗，没有用于抗战，而是饱了蒋介石集团的私囊，极为愤慨。他到了重庆，看到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对抗战前途益感忧虑，故决定去延安，却受到蒋介石集团的种种阻挠。他排除一切障碍，终于到达延安，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目睹延安军民奋起抗日，卓有成效，他开始确信救中国者非中国共产党莫属。对抗战前途，表示乐观，并到处宣传延安精神。从此，他坚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边，与蒋介石卖国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当日寇逼近南洋之时，许多人劝他暂避锋芒，但他却坚持留在南洋，组织侨众抵抗日寇，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夕，他才匆匆避往印尼。

全国解放前夕，正当酝酿成立人民政权之时，我在香港。一天，饶彰风找我，谈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已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华侨界需要推举一位侨领，以领导华侨工作。而这一侨领唯陈嘉庚最适宜。他拟让我赴新加坡，邀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参政。我奉命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先生，说明情况，并转达这一真诚的邀请。陈嘉庚先生当即表示接受邀请，但又顾虑新加坡殖民当局会因此加害于他的亲属及在南洋的产业。我对他说，不要紧的，你尽管回去。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要回去，而是国内发表了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



地政府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陈嘉庚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并邀我同行回国。我说，请你先走，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们会在祖国再见的。不久，陈嘉庚先生即收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电。

1949年9月，陈嘉庚先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宣布委任他为中侨委主任，我为副主任。从此，我们在新中国的侨务战线上再次共同战斗，直至他1961年因病逝世。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在南洋胼手胝足几十年，那里有他艰苦创业留下的巨额资财，有他100多个嫡亲子孙。全国解放后，他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国定居，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他不愧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儿子，爱国华侨的楷模。党和人民对他一生的功绩，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名字将与那些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不朽贡献的先驱者们一起永垂青史！

陈嘉庚先生的遗言

◎ 庄明理

陈嘉庚先生逝世20周年了。20年来，每接触到与陈老有关的事物，莫不令人回忆起嘉庚先生的许多往事。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著名爱国人士致以深切怀念，陈嘉庚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陈嘉庚先生对党和国家、对社会有着不朽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给予海外侨胞和广大归侨、侨眷以莫大的鼓舞，成为全体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1958年初，我因事回福建，并去厦门看望嘉庚先生。适先生正准备到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及一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顺便陪先生一道北上。在火车上看他有点疲倦，问他是否身体欠适？先生答：“最近有时感到头痛，睡眠不太好。”我请他早点休息。翌晨过其卧室，发现老先生右额眉上有一点隆起，似是碰伤，问先生是否夜里起来摸黑碰伤？他说：睡不好，起来两次，似未碰着。他一面答一面用手摸自己额头，觉得右额眉上确有一个肿块，就说：“或者是夜里车开得快，摇晃，不注意碰了一下，不要紧。”到京后头几天，头痛未见轻，隆肿的瘤子更加明显了。请他到医院诊治，嘉庚先生不愿意。他自己看新编药册验方，抄了头痛、头风一剂验方，交随来的服务员到中药店买。方中有一味“川乌头”，写明“半生熟”，药店的配药员不理解药的用法，而以一半用制川乌头，一半用生川乌头，与其他药物共研为末。当天晚上服了一剂，晨起空腹又服一剂，不久，觉得头晕，即和衣躺在床上。服务员见时间不早了，为何老先生还不下来早膳？乃上楼去请，发觉情况不对，即刻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即电话通知保健局及北京医院，请医生急往马匹厂陈老住处，我们也及时赶到。上楼一看，发现柜台上撒了一些药粉。一面请医生急诊，一面查看了药方，发觉方里有“川乌头”半生半熟，如用生的，就有毒。乃急送医院，经全面检查、诊断，额上眉头那个肿块是个



瘤子，活检证明是“鳞状上皮癌”。于是进行了手术及放射治疗。经过治疗，病况得以控制。医生及陈老本人及其从新加坡赶来看望的七子陈元济夫妇都感到满意，老人家高高兴兴回集美。不料过了半年多，他视觉发现双影。随请吴桓兴院长和上海郭秉宽眼科专家一道去集美会诊，发现右眼眶内上壁有肿块，乃请陈老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并延请几位专家一起会诊。专家们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一为进行手术，可能要伤及眼睛；一为放射治疗。嘉庚先生不接受手术。先生的二子陈厥祥夫妇从香港赶来，对医院组织专家们为其父会诊，很是感动，对治疗方案，也表示尊重他父亲的意见，最好不要手术。几位专家认为陈老身体虽很健康，但因年事已高，同意采取放射治疗，使肿瘤得以控制。1961年3月间，开始发现脑血管发生故障，病情日趋严重。这段期间，卫生部保健局加强了对嘉庚先生的护理工作，派保健医生和护士住在嘉庚先生的寓所。在京的亲友也经常到其前圆恩寺寓所探望。就在脑溢血的前夜，嘉庚先生还和我谈了一些往事，也谈了他身后的若干问题。因为时间不早了，我劝他休息，就告辞回家。刚进家门，家里就告诉我，和成同志（嘉庚先生的警卫员）来电话说，老先生请你再去，还有话跟你说。我踌躇了一下再去，进屋看老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似已入睡。我站了一会儿，还是想让他休息，不拟吵醒他，刚移步，忽闻他叫我的名。我转过身看他，问：“嘉庚叔（习惯尊称他）有什么事吗？”他说：“嗯，你请坐，有几件事，想跟你说。一、是自己身后的事，死后不要火化，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是共产党，她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人都有一死，早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行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尽早解决台湾和内地的和平统一。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的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它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嘉庚先生讲到这里，看来有点疲倦，我怕他太累，请他休息。当时随侍在旁的有嘉庚先生的第八儿子国怀和孙儿联辉及叶祖彬、林和成等。

第二天早晨，我电话问陈老的情况，据护士答，体温、血压都正常。我即向方方汇报嘉庚先生昨晚的讲话及他的身体情况。我对老人家讲话断断续续、疲倦的样子，颇为担忧。上午10点多钟，陈老寓所来电话说老先生病情突变，人已昏迷，手足抽搐，通知我们赶快去。廖承志主任、方方副主任和我立即赶去。中侨委许多同志也相继赶到。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北京医院计院长和协和医院张副院长及有关的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会诊，诊断为脑溢血。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手足抽搐逐渐缓和。